

# 回首來時路

嚴志雄\*



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碩班畢業後，我短暫工作，1990年赴美深造，1998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，之後在美兩家大學任教，2001年前後，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之聘來臺服務，一眨眼，十四年就過去了，而離開香港，驀然回首，竟已四分之一個世紀。

長溝歲月去無聲。回首來時路，暗自問，再這樣走一遍，願不願意？……

其實，我最想做的，是一個木匠，給家人、尋常百姓家做些實用牢靠的桌、椅、書櫃。好想擁有些明式家具。

文字，書本，學問，卻也是鍾情所在，宿命的。

走上研究明清文學（尤其是詩人詩歌）的路，卻是有點意外的。上世紀八〇年代的中大中文系是傳統國學的堡壘，我們從文字、聲韻、訓詁的基礎

---

\*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、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



訓練開始——當時只感枯燥痛苦，後來治學，方覺受用無窮——然後專注於「章句」，埋首「注疏」，執著於「文史不分家」。傳統詩詞方面，學到唐、宋為止，明、清、近代的，沒老師開過。大四有「論文寫作」一課，指導老師開列了一批詩家的名字讓我們選，內有「屈大均」，我不認得，好奇，又素愛冒險，就選了他。後來才知道，屈氏乃明清之際「嶺南三大家」之一。那是我接觸明清詩歌詩學之始。不記得為什麼，那篇屈大均沒寫下去，最後倒是完成了一篇杜甫「詠馬詩」之類的（同時還寫了篇關於老舍《貓城記》的，我和動物親近）。不過，後來考上碩班，倒是真的研究起屈大均來了。

我博士論文寫的是錢謙益（牧齋，1582-1664），他是明清之際「江左三大家」之一。從嶺南三大家到江左三大家，視野從廣東轉移到江南，跨度不小了，而從屈大均到錢謙益，在我個人的生命，更是從南國香島，負笈遠遊，到了美東榆城。Yale University 的所在地新港（New Haven）又稱 Elm City。在「清水混凝土」極簡美學的中文大學求學七年，在步武歐洲中世紀傳統、常春藤爬滿牆壁的耶魯大學苦修、面壁、立雪七八年，窮啊，苦啊，但心靈是何其的富有！感謝上天的恩賜。四五年前吧，耶魯業師孫康宜教授應邀回臺講學，弟子侍奉在側。記不得老師講到哪兒去了，突然吩咐我，「你講講在耶魯求學的經驗」。那是夏天，颱風剛過，水淹得嚴重。我說：「老師，我記得，我們耶魯的課是從來不停的，除非州政府宣布，大難臨頭，停課。有一年冬天，真來了一場災難性的風雪，早上接到消息，我半信半疑，當然想趁機多睡一會兒，但還是爬起來了，衝到教室，老師已經在等著了，窗外，白茫茫大地乾乾淨淨，漫天風雪飛舞。我覺得臺灣什麼都好，就是颱風假放太多了，學習不夠克難！」

迄今，我已寫了三本書，其中兩本研究錢謙益的詩作，即 *The Poet-historian Qian Qianyi* (2009) 和《錢謙益〈病榻消寒雜詠〉論釋》(2012)。此外，我研究錢謙益的單篇論文也已積有近三十萬字，日內將都為一集出版。錢謙益是我博士研修時期至今的主要研究對象。時賢喜歡開發新的研究領域，而我卻一直專注於錢謙益研究。原因何在？錢謙益是明清時期的文壇「大家」，尤以詩文見重於當時後世。他既是文人，也是學者，學問淵博，一生筆耕不輟，於文學、史學、佛學，都有重要著作，現代標點、排印本《錢牧齋全集》煌煌八大冊，其著述之豐贍，可以想見。身閱明清改朝換代，錢氏的人生經歷也很曲折，他以南明弘光朝禮部尚書之身率眾降清，更使他淪為所

謂「貳臣」，在歷史評價上，是有爭議的人物。研究這樣的一個大家，課題多，挑戰大，對個人學問的長進，極有助益，因此我樂此不疲，也不用「朝秦暮楚」，為尋找新的研究課題煩惱。研究錢謙益，可以是一個學者長期的志業。

與各國同一研究領域的學者相比較，我自信，個人的學術風格是有特色的。我一直努力嘗試把東西方的學術傳統內化到自己的研究素質中。我寫文章，理論、思辨的模式可以說是比較接近西方的，對於論述方法的合理性 (legitimacy)、論述結構的邏輯性十分重視。我相信，一個深思熟慮、恰當的方法學，有助於有效地解決問題、開展論述及深化議題的探研價值。但是，我又同樣地重視文本、文獻的細讀 (close reading)，努力揣摩古人的心思、情感，體會作品的意境，並悉心設計不同的詮釋環境，讓文本的文學、藝術、思想價值與光彩恰如其分地彰顯出來。在我看來，細讀幾乎是一種藝術，是窺探古人文心所在的重要途徑。長久以來，面對西方各種學術範式 (paradigms) 的衝擊，東方學者或多或少都懷有一種焦慮，徬徨於如何引進西學，而又能維持東方學問的尊嚴、主體性。譬如近年在後現代主義 (Postmodernism) 種種思潮的影響下，文學研究者不得不正面回應文本所引發的，諸如權力、性別、身分、他者、社會、國族等問題。文學研究朝多元開放的方向發展自然是可喜的現象；但同時，有學者擔心，一切「去中心化」(decentralized)、「去典律化」(decanonized) 之後，眾聲喧譁，卻無異失序——文學研究者已不再重視文學內部規律、特徵的探討，而對中國文學獨特的藝術魅力也缺乏真知灼見。不過，東西方學術之間如何 (或能不能) 會通這個焦慮對我個人而言是相對微小的，我以「平常心」看待、接受各種文化、理論，就研究課題所需，謹慎運用，不盲從，也不排斥。

也許，細讀應該被提到一個理論或方法學的高度來考量。細讀是讓原作者、文本直接發聲的場所。研究者在這裡展開與原作者、文本的對話，而這對話能否與研究者建立的理論、思考框架接軌，又直接關係到理論架構的合理性與周延性。因此，細讀不單是原作「再現」(representation) 的藝術，更可與研究者的「前理解」(fore-understanding) 構成一種「雙向批評」(double critique) 的辨證關係。尤有進者，中國傳統對文本的固有讀法、對字義聲韻的考證成果、對文本與現實世界交接的認識，在細讀這個場域中大有用武之地。細讀無疑是證成、補充、檢驗、挑戰研究者論述前提、延展的重要工夫。



論，也是中西學術傳統交會、對話、商榷、較勁、融通的一個極佳場所。細讀是論述的細節、局部，而從局部到局部，從各個局部到論述的整體，尚需細針密線的縫綴。在我無論是用中文或英文寫成的書、文中，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出我在這方面的努力與追求。

復次，從事文學研究，我們不僅要直視作者，也要直視文本；文本的產生，意味著詩、文作者的寫作與賦義行為，而同時，文本也反饋著作者生命的意義，以及模塑著作者流傳於後世的歷史形象。然而，該歷史形象，不是正史傳記中的形象，而是作者於詩文中展露的身影、存在的意態。還原一個歷史人物是不可能的事，但是我們可以追蹤他的身影、追蹤他的聲音、追蹤他的思想的種種投射。這些東西該從何追尋？只能從文本出發。而且，作品有它自身的結構、「理」，譬如說，律詩可能有它「起承轉合」的內部機制，我們應尊重文本的內部規律，然後從文本的種種特徵、縫隙，去重構，或是靠近作者與文本間的關係；根據材料，盡量創造性地開展出最恰當有效的談論方式，讓文本再活過來，使之與作者的生命史相連結，這也就是我近年治學、教學所強調的「文本與生命史的連接」。面對研究材料如同參禪，材料面對你時，有它自身的呼召、呼喚，有自己的 dignity。傳統說「修辭立其誠」，此語不假。就研究而言，「誠」，就是誠實地面對自己以及材料本身，如自己還沒有條件或能力讓材料發光發亮，則須一參再參，也許參到某個時刻、時機，靈光一閃，頑石點頭，便了悟——文本、生命、學問互相發光發亮。